

毛泽东为何“一日写七信”

□ 吴海勇



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成功范例。

上层统战的“外交”手段

在共产国际有意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寇加紧蚕食侵略中国的危急情境下，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定稿并向全国发表，国共两党开始谈判。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军事对垒仍在，国共通而未通。在此情形下，亲笔书信成为毛泽东沟通国民党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与亲笔书信相协同的，还有派员联络、电报联系等。派员联络通常会捎上亲书，电报联系具有近代化的便捷性，但前提是双方必须互通密码，这通常是在“亲书政治”奏效之后进行的。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以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等名义向国民党等发出宣言、通电、公开信等，以宣传共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文件虽然很多也蕴含着毛泽东的心血智慧，有的甚至出自他的手笔，但因为是以组织的名义，所以不能视为亲书。

毛泽东的“亲书政治”，以统战理论观之，可统归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写给党内同志的书信暂不入论列。

一日写七信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

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

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谋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于5月25日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在敦促西北军领导人物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于8月14日一天写了7封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锁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要人，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

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

此番去信不仅是续接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过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后者为近代白话文，前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

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寇深祸亟，情切嚶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勿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白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闯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于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与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的铺垫。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

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之所以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同时与他军书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蓬勃生命力。

（摘自2017年7月7日《上观新闻》，原标题为《“七七”事变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

整体，它们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理论系统化，给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国民党公开明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八一宣言》发表后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表示赞同。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便从国内国外两个途径与我党接触，1936年1月，国共两党派出代表在南京进行非正式谈判。不久，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防政府、国防军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涉。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抗日。

（摘自2015年8月1日《吉林日报》）



张八开版面的报纸吸引了许多文化人投稿。连日本进步文人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也常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报纸日发行量也由最初3000份扩大到一万余份。当年报社经费十分困难，报社工作人员每月只拿一点生活津贴，没有稿费，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饭和一点蔬菜，生活十分清苦。《救亡日报》办报时间虽不长，在江南各省、港澳和南洋一带发挥了鼓励抗日的积极作用。

（摘自2013年4月4日《人民政协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上的英雄史诗，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在患难中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响应

当民族的存亡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抗日倡议，以各种形式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3年3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首次筹备大会，宋庆龄发表演说，“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1933年5月，冯玉祥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其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称第三党）与冯玉祥讨论抗日，十九路军与红军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20日，宋庆龄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指出要想依靠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1935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宋庆龄等明确提出“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并主动表示愿为“国共合作救亡斡旋之责”。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冯雪峰等到上海，同救国会领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在延安两次写信给章乃器等，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民主党派积极配合共产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建立。“西安事变”前后，马叙伦两次入川，劝阻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等派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杜重远做张学良的工作。民主党派的积极活动，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中华民族转危为安、从积弱走向自强的转折。经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推动，民主党派的响应、支持、努力，伴随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1937年9月终于正式形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靠拢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大为失望，对共产党深表同情，为团结之事尤为迫切。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等联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去电报，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澜等一边抨击反共活动，一边不辞劳苦调解国共矛盾。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得知事变异常愤怒，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职教社黄炎培认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

1941年，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第三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新四军军长陈毅说，“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新四军和八路军正在敌后，党的领导又偏

不可磨灭的功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

□ 陈延武

处边区，整个大后方的对蒋斗争，主要靠民盟来支持”，其意义“也说明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性”。

这一过程展示了民主党派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站到时代前沿的勇气。从此，民主党派在组织上渐渐联合、发展、壮大，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

策应

抗战时期，国统区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是国统区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生力军，是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着社会的舆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12月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每期销量达30万份。

1937年底，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救国通讯》上详细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使之为人所知晓。

……抗战期间，民主党派发表了大量报道文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汉奸行径，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和行动，反映共产党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旗帜鲜明，启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毛泽东明确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指引，道义上声援，学术上鼓励，生活上关心，危难时解救。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时，和郭沫若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抗战初期、“皖南事变”后、香港被日寇占领后，共产党设法营救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他们由衷地表示：“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这些举措使知识分子在情感上更加倾向于共产党，其中不少人怀着满腔热情走向延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与此不无关系。

胜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辉煌的篇章。它所提出的要不要抗战到底，如何抗战到底，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回答、作了实践。

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主党派心甘情愿地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共同情感取向，并达至共同价值追求，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摘自2015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源

□ 张久旭

日军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1935年10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名义在法国《救国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文件标注日期为8月1日，故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不仅开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之路，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强调，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

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国内迫切的形势，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八一宣言》经过集体酝酿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意后发表于法国《救国报》。《八一宣言》揭露了日本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政府在对日妥协的面目，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一致赞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以《八一宣言》具体内容和政治主张为基础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党的《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一个互相联系的

抗战期间在桂林的《救亡日报》

□ 黄禹康

《救亡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该报于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后迁广州，再迁桂林。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2月28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同月24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被迫停刊。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武汉、

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后方抗日文化中心，扛起了中国抗战文化大旗。皖南事变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进步文化团体多达40多个。《救亡日报》在上海沦陷后迁往广州，广州沦陷后迁到桂林。当时，周恩来、郭沫若向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后取得合法地位。武汉失守后，1938年10月25日凌晨，白崇禧、周恩来等撤离汉口去长沙。路过沙市后，白崇禧的汽车抛锚。周恩来邀请白崇禧坐他的车。一路上，周恩来向白崇禧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鼓励

白崇禧抗日。白崇禧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社。经过艰苦的筹备，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出版。报社建立了中共支部。报纸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上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

据夏衍回忆，周恩来指示桂林《救亡日报》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经过编辑同仁共同努力，这